假信息·假视频·假照片

“世维会”制假造假煽动民族仇恨

中国警方近日成功破获一起“世维会”境内信息员编造“韶关事件”虚假信息的案件。随着一系列“世维会”和热比娅炮制假信息、假视频、假照片的事实不断被揭露，他们混淆视听、煽动民族仇恨的真实面目进一步暴露出来。

虚假信息被凭空捏造，成了所谓韶关事件的“真相”

32岁的库尔班·喀尤木是新疆阿克苏库车县人。从2008年初起，他就和境外“东突”组织通过电子邮件建立起联系，并被吸收为“世维会”信息员。

今年6月中旬，“世维会”秘书长多里坤·艾沙给库尔班·喀尤木发来电子邮件，介绍刚刚在美国召开的“世维会”三大所谓新一届“领导人”的情况，号召世界各国的维吾尔族人都成立相应组织，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

库尔班·喀尤木说，他们“让我搜集提供有关维吾尔族和国内民族分裂活动的信息。从那以后，我按照他们的指令，向他们提供有关国内民族分裂活动的文章、信息和视频”。

广东韶关“6·26”事件发生后，多里坤·艾沙等人指使库尔班·喀尤木搜集旭日玩具厂冲突人数、伤亡人数、受伤人员所在医院等情况。

在广州一家阿拉伯餐厅当厨师的库尔班·喀尤木在接受任务后，并没有前往韶关。这位“世维会”信息员编造了“我去过韶关，通过当地人了解到死了17至18人，其中还有三名女性”的虚假信息上报。他说：“我工作很忙，从来就没有想过去韶关。我只是想用虚假情况应付他们。”

库尔班·喀尤木在发给热比娅助手的电子邮件中写道：“这里的维汉发生流血冲突事件，希望你们尽快向全世界发出该信息……希望你们让全世界听到这个血腥事件，并安排部署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

他坦白：“热比娅等人利用我上报的信息和视频，在国外进行反面宣传，新疆的许多人由此上当受骗，成为导致乌鲁木齐事件发生的原因。”

有关部门指出，这些由库尔班·喀尤木提供的虚假信息，成为境外“东突”组织、反华媒体反复宣传、大肆向国内外传播的所谓“真相”，使得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受到欺骗和蒙蔽。

异国惨剧被“偷梁换柱”，成了煽动民族仇恨的视频

新疆“7·5”事件发生前夕，民族分裂分子不断抛出各类谎言，妄图制造民族对立情绪。

从7月3日开始，我国境内一些网站、论坛和QQ群里，开始流传一段所谓“维吾尔女孩被殴打”的配乐视频：一红衣少女被一群人用石块殴打致死。由名为“木卡戴斯”的人上传的这段视频妄称，这是一个维吾尔族女孩，殴打她的是汉人。“我的同胞们，血债要用血来还，汉人把我们的姑娘光身往头上砸石头，还提及什么法律。”视频大肆煽动民族仇恨情绪，鼓动维吾尔族群众组织游行抗议活动，进行“暴力反抗”。

经查证，这位名为“木卡戴斯”的人系在德国的“世维会”骨干分子，采用“偷梁换柱”的方式，将2007年5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播发的一条新闻进行了“改造”。这条新闻讲述的是一名17岁的伊拉克少女由于违反教规爱上异族的小伙，被族人用石块砸死的悲剧。

“木卡戴斯”对这段新闻视频进行了剪接，用音乐掩盖了原有的解说词和配音，删掉了红衣少女生前的照片，并谎称这个女孩是维吾尔族女孩。

而CNN主持人在原新闻节目中的解说是这样的：“我们不知道太多关于这个17岁伊拉克库尔德女孩的事情，但是我们被告知，她无视本族的规定，爱上一个异族的男孩，这石刑便是对她的惩罚。”

一幕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惨剧，就这样变成了在新疆煽动民族仇恨的谎言。

异地群体事件照片被“挪用”，成了所谓“和平示威”的证据

新疆“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发生后，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的新闻报道使民族分裂分子的残忍本质暴露在世人面前。

为争取反华势力的支持，热比娅与“世维会”继续采取煽风点火的手段，编造所谓事实真相，妄图瞒天过海，欺骗世界。

据查实，7月5日22时左右，热比娅曾给“世维会”副主席卡哈尔曼打电话说：“现在，图片资料太少了……你们要给我搜集更多的图片和录像资料。”

7月6日，“世维会”副主席赛伊提和境内的“东突”分子联系，表示“这次事件闹得不小，热比娅很满意”“汉族人死的不少”“我们要把汉族人的图片做一下处理”“看上去像维吾尔族人”。

7月7日，热比娅接受了半岛电视台采访。她声称“我们的人进行的都是和平示威，他们的行为非常和平”。然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大幅照片作为自己言论的证明，妄称“照片中军队设置了七道防线”。

“世维会”妄图通过这段采访继续欺骗世人，可是广大网友纷纷指出，这些照片在“7·5”事件发生前一个月就已经刊登在一家网站上，照片实际是媒体在对湖北石首一起群体事件进行报道时配发的图片，和“7·5”事件毫无关系。被热比娅作为重要证据展示的这张照片，反而成为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造假的明证。

“世维会”造假，远不止于此。7月8日，法新社刊发了这样一张图片：图片当中的人拿着一张照片，向记者表达了对所谓汉族警察在乌鲁木齐杀害维吾尔族人的愤怒，并且告诉记者他手中的照片来自“世维会”网站。事实却是：这张照片拍摄的是5月15日发生于杭州市萧山区一起交通事故的现场。

假信息、假视频、假照片……一系列制假造假的事实，以铁一般的证据，戳穿了热比娅和“世维会”编造的一个又一个谎言，将其真面目展示在世人面前。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看达赖喇嘛和海外动乱分子的新勾结

益多

去年拉萨“3·14”暴力犯罪事件后，达赖喇嘛同海外一些以“民运”自诩的动乱分子的关系突然红火起来。达赖在一些国家窜访，每到一地，都要专门安排同这些人见面，或联袂出场，或关门密谈。最近又传出消息，达赖将同这些人联手在欧洲某国召开“全球藏汉大会”，在印度达兰萨拉召开“2009中国民运全球代表大会”，俨然已经是一个鼻孔出气。让我们来看看其中奥秘。

各怀鬼胎的结合

挑拨藏汉关系，破坏藏汉团结，是达赖一贯伎俩，以往他对此也不加隐蔽。在他1987年“西藏和平五点方案”中，就公然提出要把汉人统统赶出西藏。去年4月达赖在纽约科尔盖特大学演讲时更大肆散布：“汉族人口占了这个共产主义国家的绝大部分，我的祖国的一切目前都在汉人的统治之下”。达赖“流亡政府”的头头桑东去年10月在接受采访时还大讲未来“居住在西藏自治区的非藏族人不享有自治权”，“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所有官员都应由少数民族担任”。这里哪有半点“藏汉友好”的影子？有的只是制造民族仇恨的赤裸裸的煽动。

但是达赖去年“觉悟”了。达赖集团制造“3·14”暴力犯罪事件、冲击中国驻外使领馆、破坏北京奥运会的行径激怒了全中国人民和全球华侨华人、留学生。海外华侨华人、留学生迅速团结起来，揭露达赖集团的罪行和谎言，保护奥运火炬的传递，用自己的行动反击“藏独”行径，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他们的正义举动和强大声势让国际社会震惊，也使达赖非常难堪。这年6月他在澳大利亚哀叹，“从3月10日的这件事情开始，无论我到何处，后面都跟随着抗议者，华人的抗议者，汉人抗议者”。8月又在法国诉苦，“这些青年的行为令人苦恼和不可理解”。

此时，如何骗取国际华人社会的同情，减少“藏独事业”的阻力，成了达赖的当务之急。经过一番精心策划，他在北京奥运会前抛出了“汉藏友好协会”的概念，宣称汉藏两个民族必须“建立一个团体，相互交流”。今年5月他在纽约声称，“最近奔波于世界各地做的主要一件事就是试图与华人社区和中国学生接触，以消除一些中国人的误会”。在丹麦一次记者会上达赖更语出惊人，“我所奋斗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汉藏大团结’”。

但是，一个搞了几十年民族分裂活动，至今仍坚持分裂主义立场的头面人物，想转瞬之间就打扮成民族团结的代表，谈何容易。达赖集团的“汉藏友好协会”叫卖数月，应者寥寥，门可罗雀。此时，一些以“民运”自诩的人物粉墨登场了。所谓“民运”人士，实际上大多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组织策划国内动乱活动的分子，跑到国外后，以谩骂“中国即将崩溃”、“中国是世界的威胁”之类为能事，求得西方反华势力的施舍维持生存，做着有朝一日“回国执政”的春秋大梦。这帮人折腾了二十年，越折腾人越少，其骨干人物不过百十号人，却成立了四五十个各色组织，“总统”、“主席”、“秘书长”一大堆，谁也不服谁，沦为国际社会和海外华人社会笑柄。一个老牌的动乱分子撰文说，“我这辈子遇到的坏人，80%以上是民运人士。与民运圈的坏人相比，社会上的坏人，简直不算坏人”。另一个老牌人物更进一步说，“民运”里面95%都是坏人。

这些已是穷途末路的海外动乱分子看到达赖的“倡议”后，喜出望外，以为从此找到一条活路。一个老牌人物当即表示，“请达赖喇嘛能够理解年轻人对他表示出的无知和鲁莽”，还有几个人无耻声称，“代表汉人向达赖喇嘛道歉”。对于达赖而言，尽管心知这些人在华人社会早已名声狼藉，但是毕竟他们长着一副华人面孔，而且骨子里反共反华，是一群可资利用的对象，于是在多次讲话中将这些人奉为“中国人民的代表”，双方结成同盟。在这样的背景下，已经出台的几个“汉藏友好协会”无一例外都是“西藏流亡政府”支持，由动乱分子拉人入伙，名为“汉藏友好协会”，实际上不过是极少数的民族败类互相勾结、共同表演的平台，是达赖集团的又一个政治传声筒。当然动乱分子们照例不会错过这一良机，马上又给自己封了一堆主席、秘书长之类的头衔，既多了一个过“官瘾”机会，也多了一条向西方主子邀功请赏的门路。

“民主”、“自由”背后的图谋

达赖集团叛逃国外五十年来，后期比前期有一点“长进”，就是从西方那里学了几句“民主”、“自由”、“人权”，用来掩饰、美化其分裂主义的真实面目。按达赖的话，此番“我们要搞统一阵线，中共为了保卫独裁政权搞统一阵线，我们为了正义和真理搞统一阵线”，“只有汉族、藏族、维吾尔族等各民族共同团结，建立统一的民主阵线，才能最终推动整个中国走向民主。”

动乱分子也心领神会，马上予以附和，宣称将“立即着手建立中国民主大同盟”，“政治目标就是推翻中共政权”。近一个时期，海外各路动乱分子头目纷纷朝拜达赖，有的宣称“只有达赖喇嘛才有魅力和权威整合中国海外民运力量”，有的称达赖为“中国民主运动精神领袖”，更有一个“党”撰文提出让达赖将来作“中国的总统”。为了取悦达赖，几个老牌动乱分子公开声称“西藏早晚会是独立国家”。

在动乱分子强劲吹捧下，达赖有点忘乎所以。他似乎忘了前不久他还声称“愿意在中国宪法框架内解决问题”，忘了“愿意改善与中央的关系”的表态，近日在达兰萨拉向一些动乱分子宣称，“对中国政府不抱希望，希望大家一起进行更为长期艰苦的奋斗”。他在美国更称这些动乱分子是“真正的同志们”，叫嚣“共产党已经领导中国60年，该是退休的时候了”。

旗号有了，“领袖”有了，政治目标也“统一”了，当然需要有个仪式热闹一下。达赖集团宣称即将召开的“藏汉大会”将讨论“西藏前途、中国民主化等重大议题”。而动乱分子则联合“达赖私人秘书处”、“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宣布，这次大会后还将“根据达赖喇嘛尊者的时间”在印度达兰萨拉召开“2009中国民运全球代表大会”，“正式确认达赖喇嘛尊者为中国民运的精神领袖地位”，“产生统一的领袖和领导集体”，“为回国执政做好充分准备”。

事情再清楚不过了，所谓“民主”、“自由”最终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人民民主政权，分裂中华人民共和国，由这一小伙人回来执掌政权。

必然失败的命运

表面上的相互推崇，难掩背后蝇营狗苟的考量。一个老牌动乱分子曾说过，“民运”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人，为了争夺西方经费援助、保护既得利益，互相谩骂、中伤，不仅浪费了内部资源，也丧失了大量经援。这样一群人的这样一个毛病，当然也要带到此番同达赖集团的结合中来。就在一些动乱分子去年11月拜见达赖后不久，博讯网上一篇题为《应该请达赖喇嘛直接投资国内民运进程》的文章称：达赖喇嘛是民运的最大依靠，民运中的人只要不出于私心，为民主中国恳求达赖阵营拿出几百万澳元不是难办的事，只要与达赖实际结盟，他们毕竟有点家底。另一位老牌动乱分子说的更加直白，“达赖只不过是一个到处化缘的和尚而已，若不是诺贝尔奖光环，恐怕他只有整天坐在庙里守着那几盏酥油灯了，民运也要学习西方，需要的时候就哄哄他，平时不必对他太认真”。

达赖在国际上混了几十年，对这些动乱分子的家底多少有些了解，当然也会留着一手。今年3月10日，尽管达赖与动乱分子代表团举行了正式会面，但事后达赖集团一再表示，这是在对方“要求下”举行的，也并没有答应他们提出达赖喇嘛出任海外“民运”精神领袖的要求。正如有海外评论指出，“达赖将民运视作一堆臭泥，他与民运人士虚与委蛇，不是因为后者有什么力量，而是为了造成‘汉族人民也支持藏独’的假象。民运一方面被达赖蔑视，一方面又被达赖利用，真是又可怜又可悲。”一位早已退出“民运”的人士看得清楚：“民运向企图分裂国家的达赖集团靠拢是错上加错，会激起海内外华人华侨的强烈反对，其内部也会产生意见分歧，甚至会进一步引起力量分裂。达赖集团尽管有些资源，但他们不会轻易为民运埋单。”

很显然，这样一桩基于政治和金钱算计的“联姻”，不过是自娱自乐、自欺欺人罢了。接下去的表演，不看也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新华视点

1.3亿人的“门槛” 13亿人的心“槛”

——取消乙肝“两对半”检测激辩的背后

中国疾控中心的一位专家2日在一次会议发言时透露，卫生部拟出台政策，在入学、就业等常规体检中取消乙肝“两对半”检测。虽然当晚卫生部新闻发言人表示，这只是专家的观点，并不代表政府的官方意见。但取消检测的消息一出，旋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检测乙肝“两对半”，这是我国1.3亿乙肝感染人群入学就业的一道“门槛”；而对乙肝人群的歧视，则是全社会需要迈过的心“槛”。

至今，网上存废之争仍在继续，支持者与反对者营垒分明，论辩激烈。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接受记者采访的国内多位权威专家旗帜鲜明地“亮”出了一致的观点：取消乙肝体检“门槛”是大势所趋。

取消还是保留？这不应是一个问题

“看到‘就业入学等常规体检不再检查乙肝’的消息，一个人躲在卫生间大哭了一场。”一位署名“无同语”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在网上发文说。

她说，自从被查出是乙肝后，“乙肝”二字就成为她人生中的枷锁——报志愿时放弃了自己喜欢的医学和教育；大学时偷偷地吃药，梦见被同学们发现而伤心地哭醒；毕业了不敢找很正规的企业；上班了偷偷找人抽血代检；对恋爱有莫名的恐惧，找不找男朋友都无所谓了。

“这是我们共同的期盼”——许多网友发出这样的声音支持“无同语”的帖子，并且建议国家通过立法把这一做法确定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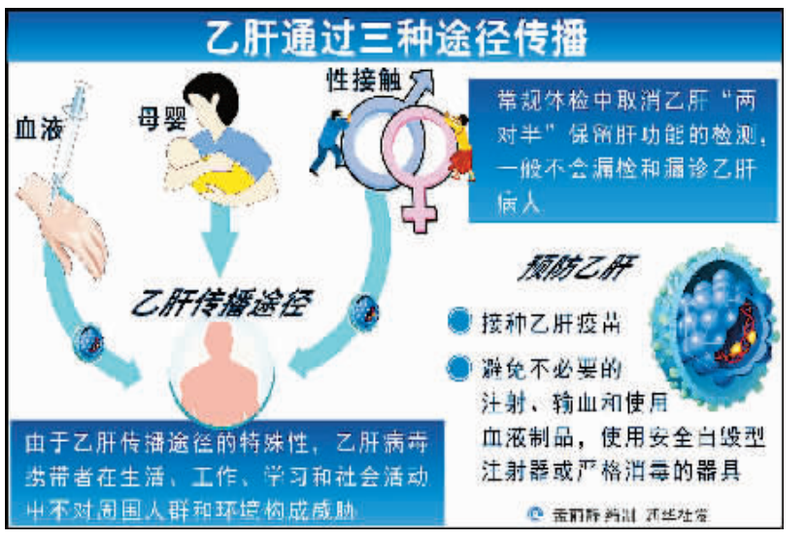
人们对这条消息的关注并非毫无来由。近年来，在就业、升学等方面屡屡发生“乙肝歧视”事件，个别甚至引发血案，常常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一位母亲在寄给庄辉院士的信中疾呼：“感染乙肝是一种不幸，但绝对不是一种错误，更不是一种罪过！为什么不能受到公平的对待？”

“这些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呼声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流行病学专家庄辉指出，“我同意在入托、入学和就业体检中取消乙肝病毒指标的检测。”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主任贾继东对此也同样持赞成态度。“一般接触不会传染乙肝，对此国内外的共识都很清楚，这对肝病或传染病专业人员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

贾继东表示，在入学就业体检中取消乙肝检测，一方面可以保护个人隐私，同时也是维护公民平等权利的需要。“入托、入学和工作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从医学科学上讲，只要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体能状况能胜任学习或工作，就不能剥夺其权利。以人为本的现代社会理念，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个体，尊重其生存、发展和享受福利的平等权利。”



“我认为乙肝检测项目到了应该调整的时候了，也具备了调整的条件。有关部门也一直在积极主导、敦促这件事情。”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中心副主任李黎说，此前之所以列为检测项目，可能源于对这种疾病的传播特点和途径认识不足，而且也没有有效的免疫手段。

歧视还是保护？对乙肝传染的误读

争论中，一些网友或单位认为，保留乙肝“两对半”检测是对其他人健康的保护，取消检测可能会导致漏诊而增加健康人传染几率。作为一个接种乙肝疫苗但没有产生抗体的健康人，网友“怯薛”就很担心“取消乙肝体检”后自己的健康权益会缺乏保障。另外，还有不少人认为，因为专家建议保留肝功能检测，所以肝功不正常就会有传染性……对此，贾继东指出，这是对乙肝传染的误读，也是“乙肝歧视”的根源。

我国是乙肝大国，但我国约有40%的乙肝病毒携带者是经母婴传播的，性接触、接受不安全的注射和医疗行为等也是导致乙肝传播的重要原因。这些传播途径都有血液接触或暴露。

贾继东认为，以他人的健康为由拒收乙肝病毒携带者，这不是“保护”，而是歧视。那种“保护1亿多人的隐私权会伤及10多亿人的知情权”的说法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乙肝病毒携带者对周围人没有危害，所以不存在侵犯其他人知情权的问题。如果对其他人有危害当然不会这么做，比如非典病人，国家就会进行强制隔离。

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的律师邵先生提到，假如和一位乙肝病毒携带者共同进餐，而双方刚好又同时有牙龈出血或口腔溃疡，那是否有可能被感染？

“这就像是坐在办公室里被天花板砸到一样，是概率极低的事情。”对于这种担忧，贾继东回应说，随着乙肝疫苗接种率的不断提高，以及防护知识的普及，这样传染的概率就会变得更低。

而网友“沙尘暴的雨点”则提出，有相当多人都是体检时发现自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才去医院就诊咨询。早期发现问题，才能更好地控制病情。他担心取消“两对半”检测会使一些肝功能指标正常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因不知情而错过了科学保养和及时治疗的时机。

对此，庄辉院士表示，因为保留了常规体检中肝功能的检测，所以乙肝病人一般是不会被漏检漏诊的，也不会影响乙肝的发病监测。“我国入学就业体检中没有规定要检测其他肝炎病毒和艾滋病病毒，但并没有因此导致发病人数增多。”他说。

同时，贾继东还强调，体检中要求检测肝功是从个人健康、身体耐受角度考虑，而不是考虑传染性。乙肝传染性和肝功没有任何直接关系，而与血液中病毒水平高低有关，传染途径也不会因肝功异常而改变。举例说：和一个乙肝病人握手也不会传染，但如果被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血液污染了有伤口的皮肤，则仍有可能被传染。

能否走出歧视困境？要做的不只是删除一两个检测指标

了解乙肝病毒携带者情况、维护民众健康、减少乙肝患病人数，这是乙肝检测的目的。“但是设置‘乙肝门槛’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对此贾继东直言不讳，反而是滋生了“乙肝代检”，让乙肝病毒携带者因为担心被歧视而隐藏得更深。

这几年，卫生、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中都要求不能歧视乙肝病毒携带者，但实际操作中，仍有一些单位以别的理由拒绝录用乙肝病毒携带者或乙肝患者。

“如果入学就业取消乙肝检测的话，一些学校和用人单位也就没有歧视的基础，选择会更客观公正。”李黎说，从公共卫生预防疾病的角度来说，基于科学认识取消歧视性的“门槛”，跟进相关政策加强健康管理才是正确的选择。

李黎介绍，目前我国已由1992年的乙肝高流行强度下降到2006年的中流行强度，5岁以下儿童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携带率降到1%以下。“这一成绩得益于我国加强了乙肝疫苗的接种，以及对医疗行为和采供血的规范管理。”他说，今年我国又启动了为15岁以下人群补种乙肝疫苗的重大公共卫生项目，下一步还将考虑对成人中的高危和重点人群开展乙肝疫苗接种，今后几年乙肝病毒携带率可能会进一步下降。

但李黎同时指出，“取消乙肝检测不等于不管了，应有跟进的政策措施，在操作细节方面依照科学进行完善，这正是专家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比如在入学就业体检中增加或保留肝功检测，同时建议受检者自愿接受‘两对半’检测，这对控制疾病有利，同时也对保护乙肝病毒携带者或乙肝患者本人的健康有益。”

李黎认为，在取消作为“门槛”的乙肝检测的同时，应在健康体检中设立乙肝检测，并纳入居民健康档案，这于国于民都有利。

贾继东也呼吁：“希望大家都进行健康体检，这种体检不仅应该包括乙肝检测，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这种体检应完全出于对受检者健康考虑，是一个健康管理手段，绝对不能成为一种‘门槛’。”

此外，庄辉院士指出：“要关爱乙肝病毒携带者和病人，不能歧视；同时加强对乙肝防治知识的健康教育，使公众正确了解乙肝是如何传播，如何预防。”

受访专家们还认为，一则“取消乙肝体检”的消息引起如此广泛的讨论，说明公众对公共卫生的关注度很高，“这是好事”。但人们的争论同时也折射出了公众对乙肝和乙肝病毒还缺乏科学认识，而这恰恰是“乙肝歧视”之所以难以消除的症结所在。

要真正消除“乙肝歧视”，我们要做的远远不只是删除体检中的一两个指标，全社会观念的转变也迫在眉睫，取消1.3亿人的乙肝“门槛”将有利于让13亿人跨过自身的那道心“槛”，走出歧视的困境。

记者 周婷玉 孙闻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新中国档案

新中国的土地改革运动

1951年6月5日，四川省合川县南津乡农民焚烧地主的土地契约书，庆祝土改胜利。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土地改革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彻底铲除封建剥削制度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我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领导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前，占全国面积约三分之一的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已基本完成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国家要“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据此，从1950年冬到1953年春，在新解放区占全国人口一多半的农村，党领导农民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

1950年1月，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在各级人民政府内设土改委员会和组织各级农协直接领导土改运动的指示》，开始在新解放区分批实行土改的准备工作。党中央明确规定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对于地主分子，同样分给一定数量的土地，让其在劳动中改造为新人。

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和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成为指导土地改革的基本法律依据。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同时规定，把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便更好地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稳定民族资产阶级。归根到底，是为了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土地改革从1950年冬开始，有领导地分期分批地进行。每期一般经历了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没收和分配地主土地财产、复查总结和动员生产等步骤。各地政府都派出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领导土改运动。大批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教授）和许多民主党派成员报名参加土改工作队，投身到这场伟大斗争中。各地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培养积极分子，逐步把群众发动起来，建立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农民协会，作为土改执行机关。随后，进行划阶级，开展对地主阶级面对面的斗争，揭露他们的罪恶，打垮他们的威风，并对其中罪大恶极的分子和破坏土改的分子实行镇压。在斗争胜利的基础上，由农民协会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并在分配完成后进行复查，由人民政府颁发土地证，整顿与加强政权和民兵组织，引导农民发展生产。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到1953年春，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我国大陆普遍实行了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使全国3亿多农民无偿分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批生产资料，而且不必每年再向地主缴纳约3000万吨以上粮食的地租。

土地改革真正实现了中国农民数千年来得到土地的奋斗目标，使农民真正从经济上翻身作了主人，从而最深入、最广泛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土地改革还确立了贫雇农在农村中的优势地位，巩固了工农联盟，为引导亿万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创造了条件。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上海那栋倒覆楼房开始拆除

8月5日，上海市闵行区“莲花河畔景苑”倒覆楼房开始拆除，整个拆除工作预计一周左右完成，之后，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将作为第三方托管未倒覆楼房的后续建设。

新华社记者 裴鑫摄